



「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會議的召開及其意義

A Review for “Cultural Field and Educational Vista”: From the Late
Ch'ing Era to the 1940's

梅家玲 (Mei Chia-ling) *

一、會議緣起與經過

晚清以降到 40 年代，不論在大陸地區或者臺灣本土，都是歷史衝擊與文化轉折的重要時期；彼岸歷經維新、五四乃至於對日抗戰、政權易位，此岸則經歷了清治、日據、國民政府遷臺等重大變局。這個時域雖然不長，包含的卻是相當劇烈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動盪。其中，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更歷經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舉凡舊學制與新學制、舊思想和新思想、舊文化和新文化的糾纏滲透、影響牽動，無不具有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觸點。文化場域的變遷與種種教育革新的實踐，不但都是該時期最重要的人文研究課題，彼此之間，更有多重的糾葛互動。

但是，仔細檢視這個時域內的研究成果，大陸和國外學者成績斐然，但重點並不放在臺灣；臺灣學者的研究，則側重本土，對彼岸的關注較為缺乏。其次，無論海內外學界，文學文化和教育往往是分開處理的研究命題，能兼攝二者的宏觀性研究並不多見。此外，欲就這些命題深入研析，又往往不能僅限於單一科系領域，而是需要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共同參與對話。因此，臺灣大學中文系梅家玲教授、音樂所沈冬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王德威教授共同策劃，於民國 91 年 11 月 7-8 日，共同籌辦了「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晚清——40 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邀請國內、大陸、國

外相關學者一同參與研討，試圖藉由跨領域研究的方式，一方面增加交流、切磋和彼此激盪的機會，以期能進一步共同觀察、思索兩岸之間可能有的相互影響，以及在或傳承、或頡抗等層次上的各種複雜面向。再方面，也試圖兼顧「文化」與「教育」這兩個有所分別但又息息相關的領域，藉由這兩個領域間牽攀乖葛關係的釐清、解讀和探源，勾勒晚清以來，半世紀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變遷圖貌。

在會議安排上，內容除兩場專題演講、十四篇論文發表外，同時還包括兩場與教學實踐有關的深度座談；而邀請與會發表論文及座談的學者，也分別來自於中文、外文、歷史、音樂、傳播等各不同科系，以期將前此所導引出來的諸多相關討論面向作一統整呈現。

二、會議內容

開幕演講由中研院院士林毓生主講〈強勢意識型態籠罩下的文化與文學〉，從宏觀的角度反思過去新文學在意識型態籠罩下的發展面貌。首先對「意識型態」的定義與涵義做出說明，將此觀點放到辛亥革命的歷史點來檢視，當時出現政治、社會與文化、道德三重秩序的危機與解體，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變得鬆動與解體，也因此結構上使得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變為可能，面對未來，在思想上出現了意識型態的真空，急迫需要能夠對於未來系統性政治導向與思想的意識型態，導致作為

* 作者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強勢意識型態的各式各樣的激進主義有發展的空間，如中共利用民族主義、列寧黨組織、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及其烏托邦思想席捲中國。在此強勢意識型態籠罩下的文學與文化導致建立、維護文化與文學主體性變得格外艱難，在沒有自律（self-legislation）便沒有主體性的預設下，文化與文學也需要本身的自律性。林教授進而以魯迅為例證，魯迅的文學創作反映秩序危機下的種種矛盾，尚能保有一定的文學主體性。可是他試圖進行「思想革命」，倡導改造「國民性」，卻走向了邏輯的死角：一個在思想和精神上身患重病的人如何能認清病因乃是其思想和精神呢？他放棄了文學主體性，甘願作為中共革命的工具，乃是因為建立在對於中共革命政治的想像上，如同許多早年主張個性解放的五四作家變成了歷史的諷刺。林教授認為必須建立文學文化的自律，才不致於被他律左右，發掘自己真正的問題意識，並以此為座標，在文學文化的創造過程中，避免「錯置具體感的謬誤」（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如此才能建構起文學的自主性。

第一場研討會三篇論文研究的範疇主要集中在晚清，從歷史實例的女學生案件、小說中的女學敘述到文化場域，揭開晚清新舊之間的道德、性別、教育、文化中的頹頹、流變。

夏曉虹〈晚清女性：新教育與舊道德——以杜成淑拒屈強函為案例〉，詳盡討論當時發生於北京而轟動全國的一件通信事件：四川女學堂學生杜成淑收到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生屈強的愛慕信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包括杜將信刊登於媒體、屈強被革退、中國婦人會的分裂等，探觸到現代中國性別歷史研究的主題：知識與道德的關係，以及在中國價值體系中之性別建構，進而論證新教育與舊道德的調和與折衷。評論人林維紅認為杜成淑案所引發的各方反應，皆顯示出在新式教育的口號之下，舊中國的性別建構：「男女之大防」仍強烈阻礙新知識及新道德，論文提到的「啓發知識與保存禮教兩不相妨」並非是全然「不相妨」。

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女學論述〉，則是從晚清小說中有關女學的描繪與論述一窺女性在當時教育體系下的面貌及產生的問題。小說在晚清被賦予社會教育及傳播責任，而倡導女權與啓蒙女界是重要的課題之一，作者透過文本發現追求女權的作法幾乎鎖定在廢纏足與興女學兩項。女學堂的創辦使得女子生活空間得以擴大，

對女性產生各種影響，對男性形成焦慮。這種焦慮反映在小說中，出現不少「女界怪現象」的描述。論文討論女學倡興對當時女人的各種身心、正負衝擊，以及對男人的影響，由此觀看晚清時期婦女教育與性別議題在小說中的顯現情形，並從中抽繹當時婦女教育的思考與疑慮。康來新評論本論文為文本型平實的閱讀，認為中文學門的最大優勢在於文獻的考掘，希望能盡量使用文學經典，及增添論文的趣味性。

葉凱蒂“Entertainment Pr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Kind of ‘Cultural Field’: 1896-1920s”（晚清民初的娛樂小報與新文化場域的建立），主要探討小報的類型、小報在中國公共空間的建構中扮演的角色、小報對於世界的新認知的傳輸功能。論文勾勒出娛樂小報從1896年創始到1920年的轉變軌跡，進而探討小報與新文化場域之間的建構關係。在這二十餘年的流變中，葉教授處理到清末小報在文人與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如文人形構出上海娛樂文化、提倡休閒時間，改變了人們傳統的時間概念，傳輸了新的文化與社會價值，西方文明進入了市民的瑣碎生活，小報在民國時期建立一個影響小市民的公共領域。針對葉教授提到遊戲場小報有兩種發展，一是有多元化、不同看法與辯論的內容，一是商品化、針對市場需求設計的內容，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林郁沁提及這兩者在哈伯馬斯對公共領域的分析是相衝突的，因為前者可導致一個理性討論空間，但後者卻使讀者變成消極的消費者，另外她也追問在方法論的角度下小報的讀者是誰？

第二場研討會三篇論文的論述範圍皆關涉到大眾傳播，或是報章的副刊、教會讀物，或是媒體對社會事件的反應，正好勾勒出從晚清到30年代的大眾傳播所承載的文化意義與想像。

周成蔭“News and Novelties: Zhang Henshui and Republic News Culture”（新聞／「新鮮事兒」：張恨水與民國報刊文化），透過對連載於《世界晚報》副刊幾年的小說《春明外史》的分析，探討20年代北京的副刊文化。小說裡出現內省與自覺的新聞記者的導遊眼光，觀察新鮮、有趣、消遣的事物，強調怎樣解讀城市及把它虛構成風景。論文提出了小說與新聞的諸多糾葛與互動，如民國報刊文化產生怎樣的小說？報紙當成史實外，是否也能當成虛構的文體？連載小說成為敘述、求知、解讀的新科技，而此連載方式亦會影響到小說的體



系，由此報章體與小說體的界線很模糊。周教授將副刊的章回小說與民國報紙經營的互動，放到市場的層面來探討，以及要如何為求知的報章注入娛樂性，這也是成舍我所提的「大眾學校」與「大眾樂園」。郭玉雯評論提到《春》成了一個集體的想像成果，因為有許多民眾著迷與參與小說的進行，而張大春以新聞題材為主的《沒人寫信給上校》可作為參照系。

陳平原〈晚清教會讀物的圖像敘事〉，提到《點石齋畫報》開創了近代中國「以圖像為中心」的敘事策略，而在此之前，教會讀物《教會新報》、《天路歷程》、《畫圖新報》卻已拉開序幕。本論文關注傳教士參與報刊、出版事業的趨勢，在引進西方宗教、哲學、技術時，如何改變了中國書刊的面目，促成圖像敘事的潮流。陳教授詳盡分析以上三種讀物，深入探討圖像敘事的可能性及具體的表現技巧。除此以外，也關注到以圖像為主體所進行的敘事，與以文字為媒介所進行的敘事之間的聯繫，並且在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的視野裡，追蹤「圖象敘事」的轉移與再生。評論人賴芳伶認為本篇論文十分紮實，研究視角由對既有的學術見解之修正來切入，如認為《天路歷程》是進入中國的第一部英譯小說，對傳統說法作了極大的修正。

林郁沁“Moral Instruction and Media Sensation: The Exemplary Case of Shi Jianqiao and Urban Mass Culture in 1930s China”（道德指向和媒體轟動：論施劍翹事件和30年代中國城市大眾文化），探討1935年施劍翹為報殺父之仇，刺殺軍閥孫傳芳一事。此謀殺案及其審判引起極大轟動，報章、雜誌詳盡報導，藝文界也以戲劇、歌曲，甚至連載小說的形式，向社會大眾傳播此事。此論文檢視新聞工作者、作家、劇作家如何利用施劍翹事件探討有關道德、女性及現代性的議題，指出有些人把媒體當作一個論壇，對什麼是一個現代人及現代國家的涵義提出道德面的指向。作者也認為大眾並不是單純被動地受媒體這種道德指向的影響，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大眾對此事的情緒回應，造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大眾同情」的道德及政治力量，而這股力量也牽動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評論人楊芳燕認為本文層次繁複，至少牽涉到三個層次：現代性的問題、歷史性的問題及媒體扮演的教育功能，而媒體對此事的態度、反應，揭示出媒體在文化場域中的教育功能。

第三場研討會論文研究的視角從20年代北京的雜

誌調查到日據時代臺灣的期刊與作家，探討其文化、教育意涵。

清水賢一郎“*What Books Young People Loved Best in the 1920s Beijing: Space and Structure of the Readership of Jingbao Fukan*”（1920年代北京的青年讀者群體及讀書空間——《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調查的個案研究），縝密分析當年副刊提出的「青年愛讀書」與「青年必讀書」之調查表，揭露調查表潛藏著錯綜複雜的權力運作。從調查卷的調查方式、到投票者的投票趨勢，透過各數目資料的鋪列，如年齡層、教育背景、對白話與古典文學、翻譯文學的偏好、宗族、同鄉關係等，重構了20年代北京青年閱讀群體的現場。論文探討青年愛讀與必讀什麼書，比較與釐清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與趨勢，並且梳理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之間的關係。從以上的歸納與分析進而探討讀者的閱讀空間，報章成為公共空間的開創，號召志同道合者集合在一起，尋求群體式讀書的理論架構，初步勾勒出讀者如何透過閱讀活動形構出想像社群的輪廓。評論人嚴峰認為還可再深挖「必讀書」與「愛讀書」的參照系之間的牽掣糾葛，如責任和趣味、菁英和大眾之間的齟齬，若是追溯到晚清張之洞、梁啟超等人列的必讀書目，當中有何變化？相比起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他問道「必讀書」與五四運動是否有更直接的聯繫。

江寶釵〈日治臺灣藝旦的教育書寫及其文化視野：以「三六九小報花系列」為觀察場域〉，以1930年臺南創刊的《三六九小報》裡的〈花叢小記〉專欄作為觀察的對象。該欄以介紹藝旦為宗旨，附有藝旦的相片，書寫者多為傳統文人。作者對此系列專欄做了詳細的比對與歸納，探討藝旦的符號與故事、身世書寫、教育書寫及性別視野，藝旦才藝的活動場域與交遊活動也有所碰觸，進而探討藝旦教育書寫視野的性別視野及其文化意義。作者將此書寫放到工業與性別的角度來探討，提出文人對藝妓的生涯與品題的紀錄，隱含著性別分工與不對等的前設。而專業生產者、書寫者與閱聽者的文學偏好受到其他身分人士如富商的消費支撐，使得藝旦書寫與藝旦養成形構出一定的文化品味，性工業由是進一步階層化。藝旦是上階層人士的專屬的風雅活動，在日治時期，是進展中的臺灣現代性的一部分。評論人施懿琳認為此篇論文沒有說明何以選擇《三六九小報》的「花系列」作為研究材料，並且將南北臺灣的藝旦混為



一談，需要進一步釐清。

陳芳明〈現代性與日據臺灣第一代作家〉，追溯現代性如何從西方資本主義擴張進而在日本殖民體制的建立過程中轉嫁引入臺灣，並且檢討其對當時知識分子、媒體、啓蒙運動等引起的一連串效應。由於角度的不同，日人與臺灣知識分子對現代性上的體會有所差距，前者是為了開發島上的資源，擴張其資本主義，帶有文化優越感；而後者視為一種精神上的體會，具備強烈的批判精神。作者以張我軍與賴和做為兩種文學批判的典型，概述他們如何試圖從封建傳統與殖民體制的雙重束縛解放，重建文化的主體，喚醒民眾抵抗日本人現代性的假面，但是在批判時卻會碰到兩難，蓋因殖民與現代性在日本人建構起的強勢論述中已被牽扯在一起，若要抵制殖民，也要抵制現代性，否則便得同時接受，這使得許多臺灣人發生文化認同的動搖。評論人廖咸浩認為論文觀點可能會掉入傳統是比較黑暗的，而現代化之後的社會是比較幸運的窠臼，另外還需更深刻說明現代性並不全然帶來進步的好處，可能還具備了管控人民、發展權威的特性，及釐析日據拿西方現代性作為抵抗的策略時，會否導致對自身傳統文化的認識的扭曲。

第四場研討會把焦點放到 30、40 年代的上海與臺灣的音樂上，試圖透過某一個地域與歷史片段的音樂現象深入窺探社會文化的意義，恰好地域上的差異尤其能凸顯音樂在這兩個地區在同時間上迥然相反表現。

洛秦〈「海派」文化中的「媚俗」和「時尚」——30 年代前後的上海舞廳、流行音樂與爵士的社會文化意義〉，透過幾個特定的領域範疇的資料排列、調查，如舞廳、流行音樂、爵士等，試圖還原回 30 年代前後上海市民「海派」生活方式，進而梳理其背後的文化意義。研究的對象包含了舞女、歌舞廳所聘用的各個地區國籍的樂隊、唱片公司、歌星、電影、廣播電臺播唱的流行歌曲與歌舞社團。本論文認為「海派文化」的深層心理隱藏了「媚俗性」與「時尚性」，乃是上海都市文化中基本階級文化的反射，反映了消費者的社會群體的屬性。如果說「海派」的「租界性」和「國際化」是其形式和地域現象，那麼與之相配的是「媚俗」和「時尚」的內容和人格本質。評論人黃均人認為此論文呈現出較低階層的歌舞廳的歷史意義，清楚描繪老上海的音樂生活，研究方向已從 what happen 轉至 why happen。

王櫻芬、劉麟玉〈從 1943 年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

的見聞看戰時臺灣音樂生活〉，根據 1943 年黑澤等人組成之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來臺調查所留下的調查日記手稿等原始資料作為出發點，佐以當時報章雜誌的報導與日治時期的官方史料、二手文獻、田野調查等，勾勒出 1943 年前半年的臺灣戰時音樂生活，並探討了戰爭時期臺灣音樂被禁止的情形、「敵性曲盤（唱片）供出運動」的性質，與當時皇民奉公運動的關係。作者透過追問反思一連串的問題，如漢人音樂受到禁止，為何放送局（廣播電臺）的節目中包含了漢人的傳統音樂？調查團在酒樓看到藝旦和樂師演出的「新臺灣音樂運動」，當中具體情況為何？新臺灣音樂與新日本音樂有著怎樣的關連？評論人許雪姬認為此論文已盡量使用臺日兩方收藏的原始資料，但還可進一步閱讀採集由《日日新報》演繹出來的皇民新聞、皇民奉公會的機關報等。而曲盤供出一事在皇民化運動下非單獨事件，可略述其附帶情形。

第五場研討會三篇論文的研究視角集中在某一類型的思潮研究，從公羊思想、科學共同體到現代性，正好透過不同的材料梳理出文化的深層面。

陳昭瑛〈連橫的《臺灣通史》與清代公羊思想〉，指出連橫的《臺灣通史》將傳統的春秋史學思想與反帝之現代思想結合起來，而此種寫法其來有自。在此觀點下，本論文探索連橫的先驅人物，從而將連橫放置到清代思想史的脈絡，並分析連橫史學之支柱的「種性」、「國可滅，而史不可滅」的思想與清中期至晚期的中國思想之間的關係。透過人物的對比，作者論證連橫與龔自珍「斷絕存亡」的史觀，另一方面也從連橫與章太炎的事蹟、學術切入兩人的「種性」思想，說明兩人通過公羊思想的洗禮，成為具有現代性的中國民族主義。評論人張素卿追問公羊表彰之排專制，反映在連橫思想上有哪些，當中有什麼現代內涵？此外，排專制之觀念，從龔自珍、康有為而來，但是連橫為何要寫史？

汪暉〈科學共同體與新文化運動的形成〉，討論到近代科學期刊、教育與共同體的形成，使得文化領域形成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所謂「啓蒙」可視為「兩種文化」形成的歷史過程。本論文深入地介紹了一般論者在討論啓蒙時忽略的科學文化，及其背後所承載的意涵，同時探討「兩種文化」複雜的互動關係，以重新修訂此概念。科學群體的科學思想包含著重要的社會文化內容，如何用科學知識參與現代價值觀的塑造，論證科



學共同體與近代國家的關係，從中國科學社的早期活動、科學家群體的科學思想，如討論科學與道德、社會政治、人生觀、進化論、知識分類等課題，而另一方面愈來愈多非科學領域的人使用科學語言，這互動造成新局面：科學共同體的話語實踐與社會實踐用科學知識譜系取代天理宇宙觀，從而為反傳統的文化實踐提供自然觀的前提。王遠義評論此文，認為要區分科學與科學主義、科學共同體與科學話語間的關係；除科學人生觀，還要討論自然的科學觀；人文與科學兩個文化外，要有第三種文化；材料可以再增加《科學方法論》及 1916 年留學生在日本出版的《學藝》刊物及需進一步說明進化論此複雜的思想。

張小虹〈現代性的小腳：文化易界與日常生活踐履〉，全文的論述軸線分成兩線，一線是循傳統解纏足論述，以男性知識菁英觀點為中心，探究此主流「國足」論述如何將「纏足」變成「殘足」，以及其中所涉及之性別焦慮移轉與創傷固結。另一線則企圖另闢纏足論述的蹊徑，由強調「斷裂感」的男性知識菁英論述，轉到著重「連續性」女性日常生活實踐。本文由此指出作為國族／國足象徵的纏足，被摒棄於現代性之外，但是作為踐履行動的「符號」的纏足，卻以繁複的方式重複與改寫國族／國足論述。劉紀蕙評論本文在論點、方法上都有所翻新，幽默、機智和犀利，同意中國現代性是要除舊佈新，女人的小腳從性戀物變成眼中釘，轉變上是「視覺空間化，空間本體化」，變成國族恥辱的象徵。同時她也追問女性纏足與辮子不剪，女性真正的主體性存在嗎？

此外，本次研討會緊扣教育與文化的主題，安排了兩場座談會，其中第一場座談會「文化研究與教育實踐」，由教育部顧問，也是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主任黃寬重主持，羅然、王鴻泰、劉紀蕙、梅家玲教授從各屬的教育領域談相關論題。王鴻泰教授的論點集中在我們如何寫這半個世紀以來的臺灣當代文化史及有沒可能重寫一部中國通史或文化史？從文本與史料問題切入，除了政治範疇外，能否把語言史、文字史、神話史、宗教史、學術思想史涵蓋進來？從論述方式的角度而言，文化史不再完全以實證為取向，其中以豐富的想像力編織史料之間的關連性，擬定適當的概念，進而確定這些被串連起來的社會文化現象。王教授也反思一旦歷史成為開放的文化場域可能對教學造成很大衝擊，教師難於

適應缺乏大一統的歷史架構。梅家玲教授以個人中文系的教學經驗討論，在課程中以「社會生活與文化研究」為核心議題，利用學術活動與網絡資源，開發多元性、整合性的課程設計。這計畫的重要目標就是落實臺灣的本土研究，同時也提醒研究臺灣問題需有參照座標，特別是晚清到 40 年代。劉紀蕙教授從個人的教學理念切入，反思如何把自己思考的問題與知識背景帶到課程中？要傳授怎樣的知識？教育時對話的對象是誰？她認為在各學科專業知識有很多共同的問題、癥結，因此不能侷限某一個方法。在課堂中她以強調跨領域、學科的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並且設計基礎的文化理論為基礎語言，讓不同科系背景的學生得以對話，然後再銜接到臺灣、中國 20 世紀的問題，如省籍、族群等，把一個似抽象、架空的思考體系帶回到實際的問題。羅然教授以捷克特殊的歷史背景為例，探討由科學研究出來的東西如何實現在具體的教育過程，進而追問獨立、客觀的研究與教育過程的關係。她分析了捷克獨立的研究是逐漸發展出來的概念，而文化研究與教育有不同的路線。

教育在中國可謂最古老的文化建構，但是另一方面卻又是現代文明的機制與發明，由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兼主任王德威主持的第二場座談會「教育、文化、教化：現代史的視野」即就此多所探討。柯慶明教授以質疑「教育」的角度切入，指出新文化以來發展出的「五育並重」教育觀念受到智育的壓迫，以及資本主義的汰舊換新，形成深層的焦慮與問題。汪暉教授指出晚清那一代人認為他們用過去傳統知識與世界觀仍然能夠有效地回應現實問題，而我們這一代人卻不斷要推陳各種新理論。他也將視角投射到 30、40 年代研究處理到的日常生活、大眾文化：民間的文化，到底在現代文化的場域中有什麼位置？若離開戰爭、革命、動盪、遷徙等過程，僅僅講 30、40 年代的大眾文化或印刷，無法呈現 30、40 年代的日常生活。陳平原教授則很有系統性地提出四個問題，第一是一般讀者與理想讀者的區別，後者具有批評、傳播的功能。第二是傳播文明的三利器：報章、演說與學校，教育者的權力、地位、修養以及趣味，實際上主宰了「現代文學」的詮釋。第三談「課程」，關注大學裡用什麼方法來教學生。最後提及文學史家之「介入」教育史論述，把教育從純粹的教育史中帶出來，將其帶入文學生產與傳播。沈冬教授則是從時代的聲音（音樂）切入，介紹了晚清到 40 年代中



國音樂的變遷，並且帶出幾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如將近現代音樂稱為「新音樂」的命名問題，由於當時樂歌課納入課程制度，從歐美、日本引進大量歌曲，已是二手傳播。又如很多文學家說五四白話文運動對音樂有影響，可是比起偏向於西式的白話歌曲，當時一般聽眾對傳統音樂的接受度更高。沈教授也指出抗戰時期音樂與政治的關係極為密切，可是歌曲多已流失，而研究者多重視解放區、上海淪陷區的音樂資料，國統區的音樂研究呈現出的空缺是亟待填補的。王德威教授提出眾多小說實例說明晚清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各種教化、教育、啓蒙的方案都被提出，有的想從傳統教化機制得到啓發，更多在「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的旗幟下對教育啓蒙展開新的想像。王教授認為晚清到49年，以教育為題材的說部的作品，把小說視為教育、教化的手段，希望藉著小說達到更高的啓蒙目的，作品包含了實地的海外留學經驗、教學實踐與體驗、宗教對社會的教化、性別與教育以及反教育等問題的反思。

最後閉幕演講由中研院院士許倬雲以〈菁英與大眾之間〉，為這兩天會議中不斷提及的菁英與大眾文化做了總結。他從晚清切入，一直敘述到當代臺灣的菁英與大眾的關係，以及論述文化與教育互為影響的發展，如何從清末到五四乃至今日臺灣傳播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呈現出了宏大的視野與關懷面。許教授以清末民初的文化變化為例，指出菁英在發動、轉化、擴散文化時，會與大眾文化的發展節拍有些落差，當時面臨西潮，分化成兩條途徑：開創新文化、延伸傳統。傳統文化的菁英失去舞臺後，投注精力於大眾文化，如提升京劇的內容與表演形式。傳統的小說則轉變成鴛鴦蝴蝶與武俠兩個流派，經由小報的推波助瀾，成為大眾文化中主要的文學品類。京劇中的人物和張恨水筆下的市井人物活在小說中，也活在說唱、彈詞中，普遍地在一般小民百姓的啼笑哀樂中出現。跟五四新文學作家相比，這些作品雖無法進入課堂，然而在雅、俗兩個傳統中卻必須用另一個尺度來衡量。他也以新興的文化工具——舞臺劇與電影為例，前者借來西方舞臺劇的理論與實踐，後者傳承傳統，以民間故事為主流，因此雅、俗兩個傳統之間的區隔是很明顯的。許教授認為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新文化傳統，雖已佔了正統，但是卻有些問題，如舊傳統的影響遠不如西洋文化，但是西洋文化的發展自有其辯證式地進行演變，而我們只是斷裂式地擷取。當

世界在走向全球化時，更應保有不同文化的基因，以應付未來之挑戰。許教授也指出以工具性為特色的科技文化，可取用的材料更多樣化，許多傳統文化的理念因素、表現手法，都可以因為新工具，而呈現新的面貌與活力。

三、會議成果與展望

如前所述，臺灣學界中討論自晚清以迄終戰前後這五十年間，連貫性的、宏觀的論述較為缺乏，文學文化和教育兩個範疇如何相互修整、形塑，乃至於影響了整個時代人才培育與文化風格，也在目前的論述中缺席。而近年來跨領域的整合研究已成為學術界建構較完整文史圖像的策略，透過科際之間的交相支援與合作，往往能讓研究成果更富於意義的厚度。在這樣的趨勢和背景下，「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晚清——40年代」國際研討會把討論焦點放在晚清到40年代這個變動劇烈的時域，由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透過對於傳播方式、教育空間和大眾文化等面向的凝視與挖掘，檢視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在歷史轉型的時刻內，有著怎樣的變遷、互動和作用，應具有一定意義。

綜觀兩天會議，其實都已突破既有的學科領域分際，進行跨學科方向的研究與反思。而大量運用報刊資料所負載的資訊，從多方面探討當時的「文化」與「教育」問題，將音樂生活與文化納入研究視野，並且在婦女與性別議題上別有開拓，尤其是特色所在。

本來，晚清以降，「報紙」便是梁啟超所指稱的「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因此，除卻新聞史學家外，報紙刊物，同時也為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等研究者所重視。然而，過去的研究囿於學科分際，對報刊的蒐集探索，多僅著眼各自專業領域中的「史料」意義。近年來，德國馬堡大學召開「贊助新文學：1910年代的文學期刊」國際學術研討會（90年6月）、北京大學與日本大學合辦「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90年11月），開始嘗試由文化生產角度，探討其與現代文學興起、發展間的互動關係，在研究議題及切入角度方面，已多所突破。然而所探觸的，仍多屬菁英文化的層次。本研討會的多篇論文，一方面將視野擴及到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觀照當時文化場域中，由娛樂小報、社會新聞等所構築出的另類公共空間，及其閱讀者



與作者、文人與文化、道德與政治間的種種複雜互動；另一方面，科學話語、教會讀物等議題，基本上雖延續前此菁英文化對「教育」、「啓蒙」議題的一貫關懷，但「圖像敘事」的創構，實已拓展出雅俗共賞的開放性格，揭示菁英與大眾、教育與文化匯通的另一面向。再者，本研討會中兩篇關於音樂的論文，分別觸及到 30 年代上海與 40 年代臺灣戰時的生活與文化，此一「時代聲音」的進入，使音樂與文化研究接軌，再次延擴並調整了彼時文化場域的畛界。

此外，婦女與性別議題在近年中相當受到學者重視，晚清以來報刊蓬勃興盛，不僅是反映社會現象，同時成爲一匯聚種種討論及批判的空間，特別是在國家權力薄弱之際，媒體甚至具有替代性作用，幫助形塑社會道德及國家觀念，牽引出政治及文化、教育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本研討會中，即有三篇透過公眾傳媒種種報導及討論，分析其性別建構的方式，從而呈現其時文化機制及意識形態；而從性別角度重新檢視晚清以來小說中的女學和日常生活之纏足現象，亦當有助於豐富中國

性別歷史研究。

總之，開拓晚清至 40 年代此一領域的對話，讓臺灣以外的學者和臺灣研究者在此一跨科際領空中進行交流與討論，讓文化場域和教育視界隱藏的鏈結與路徑，以及其彼此滲透、影響的情況，能夠在國內外學者的論述研討中逐漸被釐清，是本次研討會的主要目標。兩天會期中，整體看來，學者們的興趣，初步集中在傳媒活動與文化場域／教育空間的遷變，以及大眾文化：時尚、影劇與音樂等議題之上。但除此而外，文化場域的變動如何導致教育空間的挪移和增縮？教育空間的變動如何反過來導致文化場域自身的質變？文學語言的改換、觀念的變造，如何影響教育內涵的形成與制定？而在歷史轉型的時代裡，文學教育又如何被當成一個實踐理念的場所，承載著文化的轉折？這些問題，還未及詳論，有待進一步探索。正是如此，本次會議所獲致的成果、所開發的面向，以及在未來學術發展上所呈顯出的潛力與活力，值得肯定；而它所引發的後續研探，更值得期待。

《漢學研究》中止稿費給付啟事

- 一、《漢學研究》（半年刊）將自民國 92 年 6 月（第 21 卷第 1 期）起，中止施行多年的支付稿費成例。
- 二、由於漢學研究中心預算經費逐年緊縮，因此《漢學研究》近期內不得不擲節開支；另一方面有些學者建議，《漢學研究》是提供海內外學者發表高水準研究心得的園地，應依循國際學術期刊的通例，不宜以支付稿費方式酬謝作者，以維護學術尊嚴。《漢學研究》編輯部衡酌上述困難與建言，經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決定自本年起取消以往致奉稿費作法。
- 三、為答謝作者惠賜稿件及對《漢學研究》的支持，凡來稿經錄用刊載，即酌贈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由作者自行選擇，論著稿件以書刊定價金額新臺幣 5,000 元為度，書評稿件以新臺幣 2,000 元為度。另當期紙本刊物 2 冊、抽印本 50 份仍照舊致送。
- 四、以上敬請作者見諒，並請繼續惠賜稿件和支持指教為禱。

漢學研究中心 《漢學研究》編輯部 敬啟